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精华

SANWEN

BAIHUAWENSHUXI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林语堂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精华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林语堂散文选集

纪秀荣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语堂散文选集/林语堂著;纪秀荣编. —2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散文丛书/林呐,徐柏容,郑法清主编)

ISBN 7-5306-0028-1

I. 林… II. ①林…②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351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2版 2002年3月第4次印刷

印数:9001—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言

纪秀荣

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漳州府平和县）的坂仔村。父亲是个乡村牧师，为人热情爽快，机智幽默。他常爱给孩子们讲笑话，把他们逗得大笑不止。幼年的林语堂深受父亲幽默气质的感染。

林语堂六岁启蒙，由父亲在家教念诗、经书和古文。十岁，林语堂到鼓浪屿教会小学上学。

1908年，林语堂入厦门寻源书院。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接触到西洋音乐，简直着了迷。还以一名基督教学校学生的身份参观了美国舰队，感受到西方进步的科学技术威力，刺激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愿望。1912年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英文。热情甚高，竟全部停止对中文的研究。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学校当了三年英文教员，此时他感到大学期间中文学习的荒疏，又继续读了大量古文和古典小说。广泛的涉猎，为他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19年，林语堂携新婚的妻子廖翠凤踏上出国的旅

程，先后去美国的哈佛大学、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林语堂受到欧美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影响，读了哥德、莎士比亚、海涅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对英国随笔的幽默和从容风格十分欣赏。这些对林语堂后来的政治观、文艺观和散文风格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23年，林语堂同妻子登轮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这年冬天，林语堂陆续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最先提出把英文humour译成幽默，并提倡幽默，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24年，林语堂参加了以鲁迅为发起人之一的语丝社，成为《语丝》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之一。《语丝》以杂文为主，注重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林语堂与鲁迅等语丝同人在对章士钊、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并肩携手、相互支援。共同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①的“语丝文体”。后来，林语堂把《语丝》时期所写的文章结为《剪拂集》出版，展现了林语堂“浮躁凌厉”时代的战斗风貌。

1926年，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段祺瑞下野，政权落入另一军阀头子张宗昌手里，反动军阀残酷迫害进步知识分子，鲁迅、林语堂都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五月，林语堂南下厦门，鲁迅为之送行。林语堂在厦大任教授、文科主任，并推动校方聘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等来厦大执教。此间，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① 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1927年，林语堂带着“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的梦想，应陈友仁之邀到武汉政府任外交部秘书。6个月的秘书生活，他目睹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公开叛变革命，原有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对革命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他感慨于自己“少不更事的勇气”，“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再也唤不起当年与旧军阀斗争时的意气，只是充满了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使得林语堂与鲁迅二人产生了根本分歧，以至最后分道扬镳。

从1932年起的三年时间里，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1932）、《人间世》（1934）和《宇宙风》（1935）三种小品文半月刊，打着“幽默”的大旗，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①，以“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②。出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林语堂办的刊物上既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些左翼作家和著名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何香凝的作品，也登载过反共文章和嘲弄马列主义、讽刺左翼文学的文章。林语堂这时期写下大量散文，多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三种刊物上，后收集在《大荒集》、《我的话》（《行素集》、《披荆集》）、《进行集》、《有不为斋文集》里。林语堂的散文，有些是把讽刺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当权者和他们的反动政策，有些是嘲讽左翼文学，而大量的游戏消闲、轻松闲适的戏谑小品。鲁迅为了坚持“五

①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出版。

②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人间世》第6期，1934年6月出版。

四”以后的战斗传统，使小品文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对林语堂的主张作了深刻的批评。认为林语堂的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①的闲适小品，将“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②。明确提出小品文“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③而非“‘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鲁迅这些批评在当时具有醒世的作用。

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从事英文著述，最初到美国时，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发表，谈他在国外的生活和见闻。后专用英文写作，有著作三十六种，其中小说、文学传记十种，散文、杂文集九种，中国文学英译本七种，编、著学术著作十种。林语堂广博的知识，操英文写作之流利俏皮，使他的作品大受欢迎。《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印行了四十版以上，林语堂获得了“文化人中之龙凤”^④的盛誉，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影响。

1947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长，带全家游历欧美各国。1965年应台湾中央社社长马星野之邀，撰写《无所不谈》专栏，四年间，用中文断断续续写了一百八十多篇，后结集为《无所不谈合集》在台湾出版。1966年6月，林语堂自美返台定居，居室在台北近郊阳明山麓，与家乡彰化遥遥相望，勾起了缕缕思乡之情，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抒情散文。移居国外或在台湾居住时期的林语堂，始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

① 《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②③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④ 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

中国抱有很大隔膜。《无所不谈合集》内，有谩骂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章，表现了他政治上的反动立场。他的后期散文，大多论古人之幽默，谈生活之享受和归隐山林之逸趣，完全是一副沦落的封建士大夫面目。1967年，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当代汉英词典》的编译，于1972年完成。1975年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结果落选。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复杂的、有争议的作家。林语堂的散文，在内容上有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特点，除其明显的政治上和观点上的差错外，他的有些思想和主张，如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等等，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特别是联系林语堂个人后来发生的变化，既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历史的局限性，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反动的阶级实质。

—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基本经历了三个时期：《语丝》时期（1924—1926），《论语》——《宇宙风》时期（1932—1936）和《无所不谈》时期（1965—1968），这三个时期记录了作者思想变化的历程。若想了解林语堂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和文艺主张，他的散文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与北洋军阀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是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1923年归国的林语堂，接

受了欧美文化思想的核心——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认为“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①，而反动北洋军阀残杀爱国学生的暴虐行为，覆没了他的理想，激起他强烈的义愤。他毅然决然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是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执行者之一。现代评论派为章士钊涂脂抹粉，并指责以鲁迅为代表反对章士钊的进步师生是“匪”。为此，林语堂写《祝土匪》与其针锋相对。他正言宣布，我们情愿“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也不作专制暴君的俳优；时代需要土匪”，“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打狗释疑》也表现了这一内容。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是这时期林语堂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第三天，林语堂就写下了郁愤情深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刘和珍是林语堂喜爱的学生，她无辜之死引起林语堂心灵的颤动，他按捺着千般悲痛，万般愤怒，再现了烈士生前的音容笑貌。以美的毁灭，激起人们对刽子手的痛恨，而更加钦佩烈士英勇无畏的胆魄、谦逊优美的人格、忧国爱国的情怀。作者深切写到，“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这种对遇难烈士所表现

^①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选自《剪拂集》。

的深切同情，是林语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林语堂没有被吓倒，反而割切表示：“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这种与黑暗社会势不两立的态度，对林语堂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探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是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的一个基本命题。《致玄同先生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等文章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所以有“欧化精神”的必要，“精神复兴”是最为迫切的工作。他推崇法国大革命，企图用西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那种积极进取精神来克服民族的卑琐、懒惰等劣根性，以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提出“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愤、卑怯、颓唐、傲惰之痼疽”的六个条件。林语堂当时虽然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推翻反动统治，因为这种民族劣根性正是长期封建统治的“治绩”，而从思想革命入手来救国比科学救国等思想要进步多了，在当时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林语堂的进步性还在于他对人民变革现实斗争的高度赞扬。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上层阶级的老爷绅士们害怕人民的力量，千方百计地诋毁和歪曲这场运动。为驳斥丁文江之流，林语堂写了《丁在君的高调》，文章说到：“本人不是要驳丁先生的，因为明白这回全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的人，不必有人来启导他。若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丁在君与其同辈，不

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并以对待民众态度不同，划分为两个阵营，“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表明了林语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

《语丝》时期，是林语堂政治上的“黄金时代”（胡风语）。然而仍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构成了他进步思想中的阴影。周作人曾在《语丝》上提出“费厄泼赖”（fair play）主张，意即对失败者应予同情。林语堂表示赞赏，在《论语丝文体》中强调：“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这说明林语堂的思想是很混乱的，后来在鲁迅的批评和帮助下，林语堂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写了《打狗释疑》，同意鲁迅“痛打落水狗”的观点。但这阴影并未消除，在以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反而扩大了。

林语堂政治上的倒退，是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之中，往日轰轰烈烈的革命处于低潮，这对林语堂是个不小的打击。此时革命阵营的分化，对林语堂更是强烈的刺激。本来思想基础并不深厚的林语堂这时产生了失望和苦闷情绪。《剪拂集序》集中反映了林语堂当时的茫然和消极。“我唯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他把自己的“浮躁凌厉”看作是“少不更事”的举动，那么长进见识的林语堂又怎样呢？他劝告青年：“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

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大祸当头，识时务为俊杰，“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仅与“三·一八”惨案相隔三年，林语堂的态度已判若二人。林语堂的这种变化，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是合乎林语常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因为林语堂不满现实，支持爱国学生，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并不是基于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正确的认识。林语堂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只是这种思想在革命高潮时处于次要地位，在革命低潮时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林语堂的这种思想在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过程中有更充分的表现。林语堂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状态下创办《论语》的。一方面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一方面又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所以他打出“幽默”的旗号，想走一条中间道路。《论语》初创时期，对现实不乏针砭，鲁迅曾给《论语》投稿，想把《论语》拉过来。林语堂这时期也确实写了不少讽刺国民党昏庸统治的文章。如《谈言论自由》、《论政治病》等。《谈言论自由》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他先说人与兽的区别，兽只会叫，不会像人能说出“你危害民国”的讨厌话，所以人不如兽自由。“猫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国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人与猫的对比，讽刺是很犀利，也很辛辣的。在当时确实有泄闷气的效果。但这种文章后来逐渐减少，而代之以逃避现实的幽默闲适小品。鲁迅见劝转不得，便中断了与《论语》的关系。

宣扬逃避社会现实与社会变革的“性灵”和“幽默”的文艺主张，是林语堂这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林语堂的文艺主张主要反映在《论文》和《论幽默》两篇文章里。《论文》（上、下篇）是林语堂借对明末公安、竟陵派文艺理论的评述，而提出“性灵”主张。他认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文学与社会现实无关，只是表现自我的喜怒哀乐。这种主张与林语堂所受的西方文艺思潮影响有关。他说，性灵派“与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林语堂早在留学时期，就推崇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派主张。克罗齐认为：直觉即表现，亦即艺术。所谓直觉就是感性认识的最低阶段，克罗齐把山川草木龟虫鸟兽之类（即客观事物），全看作是由直觉创造出来表现人的主观情感的。从而得出一切基层感性认识活动都是一种艺术创造的结论。克罗齐的美学观有着凭心灵活动来产生现实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缺陷，而且剥夺去艺术的一切理性内容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只表现个人感受的小天地，是“为艺术而艺术”理论极端的发展。林语堂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性灵即直觉，但性灵也是一种由心灵活动产生的东西，“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所以他的“性灵”主张有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缺陷，他提倡任情抒写自我之志，反对文学的功利作用，也说明了他“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社会生活和自禁于霎时感受的消极倾向。但是，林语堂在强调“性灵”的

同时，提倡文学的个性，“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必受什么古代文章作法的限制，变“以法役意”为“以意役法”。即以自由的形式表现个人的真知灼见和真切情感，而成个人风格。这些主张在当时有反对封建文学的积极意义。

《论幽默》全面阐明了林语堂的幽默理论。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一切正统文学，“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言，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能有幽默，只有像老庄这样的超脱派，豪放不羁、任情任性才有幽默。所以幽默是超脱的。幽默不同于讽刺，“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所以幽默必须温厚。幽默中，陶渊明可怜世人为五斗米折腰的温和微笑，是最上乘的幽默。所以幽默的要素是闲适。对于幽默的美学追求，确实使林语堂的散文不拘一格，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风格。而他超然的幽默，是林语堂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在三十年代复杂的斗争中起了消磨人们斗争意志的消极作用。受到鲁迅和其它左翼作家的批判是理所应当的。

直接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生活哲学的散文是这时期林语堂散文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成为我们了解林语堂的生活和思想的最简捷的途径。这类文章中，《大荒集序》、《有不为斋解》和《言志篇》是最有代表性的。

《大荒集》是林语堂继《剪拂集》之后的一个散文集子。在《大荒集序》里，他言明《大荒集》“已无《剪拂集》之坦白了”。但他强调，“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

味，而我尚未能”。对于自己的发展，林语堂似乎也难确定，“由草泽而逃入大荒中，大荒过后，是怎样个山水景物，无从知道”。这些实际上是林语堂创办《论语》时复杂心境的形象揭示。但是，他的发展趋势还是显露出来了，“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也有特种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不疲罢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木，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我素，其中自有乐趣”。“我行我素”后来成为林语堂为文、为人的准则。这种强烈的主观使林语堂听不进鲁迅等人的劝阻，钻进牛角尖里一味追求自己的天地，偶尔对现实发出几句牢骚，也是不痛不痒，批判性微乎其微。这种一意孤行，使林语堂离现实越来越远。到《言志篇》时，林语堂的理想完全是个人的享受了：温暖舒适的^①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这种理想表现了林语堂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雅致和现代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闲适哲学。这一哲学成就了他大量的闲适小品。《论西装》、《我的戒烟》、《论躺在床上》等都是大谈生活之享受。这些小品尽管写得很艺术，有的也很优美，但与水深火热的人民不相干，它是生活优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颓废的艺术。

1936年，林语堂去国外著述，这一举动是逃避现实的林语堂的必然选择。在美国居住的三十年里，林语堂与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更加隔膜，他主观上也不想了解，所以创作的源泉日益枯竭，文学道路越走越狭窄。此时林语堂利用自己精通英文的便利条件，以向外国介绍中国为写

作的一条捷径。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严密封锁，欧美读者对古老文明的中国又好奇又感兴趣，所以像林语堂这样一个通英文、并能沟通中西文化的“中国通”自然大受欢迎。林语堂这时期有名的两本散文论著是《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从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出发，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里，散布了许多歪曲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他把一部分人存在的俏皮圆滑、保守落后、随遇而安、懒惰不求上进的劣根性作为“民族特性”大事宣扬，给欧美读者留下了被他歪曲了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形象。《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大谈“家庭的享受”、“文化的享受”、“大自然的享受”等等，充分体现了林语堂的精神境界和生活趣味。

1965年，林语堂应台湾中央社社长马星野之邀，为中央日报撰写《无所不谈》专栏。此时已近老迈的林语堂对政治根本不关心，对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不了解，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攻击社会主义革命、谩骂革命领袖，使林语堂的形象又添上不光彩的一笔。

寄情自然，是林语堂这时期散文的重要内容。《记纽约钓鱼》谈了作者对自然的感受，“凡人在世，俗务羁身，有终身不能脱，不想脱者。由于耳目濡染愈深，胸怀愈隘，而人品愈卑。有时看看庄子，是好的。接近大自然是更好的”。看来林语堂把大自然当作一剂涤尽俗世烦恼的良药，那么林语堂要涤尽哪些烦恼呢？他没说，我们也就只好猜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晚年的林语堂思乡心切，他的《说乡情》、《來台后二十四快事》都表示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此时的林语堂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情绪，在佳丽的

自然景色中垂钓之时，“恍然人世之熙熙，是是非非，舍本逐末，轻重颠倒，未尝可了，未尝不可了，而终不可了”这种一切都无所谓的人生态度，林语堂自诩为道家精神，其实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沦落时的玩世主义，是消极的达观。在《论解嘲》里，林语堂说得很清楚，“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正是林语堂自我解脱的手段。林语堂的生活经历，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一个特异的存在，而他由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转变为隐士的道路，是有典型意义的。

二

《论语》——《宇宙风》时期，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高产期。这时期散文小品的内容虽不如《语丝》时期积极，但以其闲谈幽默的风格确定了林语堂的散文家地位。以后的散文也基本延续了这一风格。

林语堂的散文，不似徐志摩的华丽夸饰，鲁彦的朴素清新，冰心的雅隽飘逸，朱自清的真挚清幽，郁达夫的热情浓郁，而像谈话，海阔天空，闲适幽默。林语堂对散文创作是有所追求的，他以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①。因此，他的

^① 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见《人间世》第22期。